

汉代陶文著录与研究述论

徐正考 佟艳泽

摘要: 陶文是指在陶制器皿、建筑材料等上面镌刻、戳印、书写的文字,具体包括普通陶器文字(陶器器皿及陶片上的文字)、砖文(砖刻文字)、瓦文(瓦当及一些瓦片上的文字)。本文即是对汉代陶文出土、著录、研究等情况所做的综合梳理。

关键词: 汉代;陶文;普通陶器文字;砖文;瓦文

中图分类号: K87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1)04-0100-09

陶文是指在陶制器皿、建筑材料等上面镌刻、戳印、书写的文字,具体包括普通陶器文字(陶器器皿及陶片上的文字)、砖文(砖刻文字)、瓦文(瓦当及一些瓦片上的文字)。本文打算对汉代陶文的出土、著录、研究等情况做一综合梳理,希望能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普通陶器文字

普通陶器文字是指陶器及一些陶片上镌刻、戳印或书写的文字(为称说方便,本节的普通陶器文字简称陶文)。汉代陶器或陶片上大都只有一则陶文,一般字数较少,多数在两三字到十数字之间。从内容上分,主要有:

1. 记名,包括人名、地名、官署名、物名,如“孙君”、“河南”、“常御”、“郢称”。
2. 纪年,如“元兴元年中作”。
3. 吉语,如“大吉宜荫”。
4. 标记,包括标记容量的,如“小钟一只有盖,临孝钟一枚容三斗”;标记数字的,如“第五”;标记尺寸的,如“八尺五”;数量最多的是标记陶器内所盛之物的,如“黄粱米万石”、“小麦”。
5. 镇墓文,如灵宝张湾杨氏镇墓文:天地使者

收稿日期: 2011-07-08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YY039)和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9B022)的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徐正考(1962-),山东青岛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史及汉代文字研究。
佟艳泽(1986-),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谨为杨氏之家镇,安稳冢墓,谨以铅人金玉为死者解,为生人解罪过。瓶到之后,令母人为安。宗君自食地下租,岁二千万,令后世子子孙孙士宦,位至公侯富贵将相不绝。移丘垂墓■(■表示此字缺)下当用者。如律令!^①

6. 其他,可能是制造陶器者随意画上去的文字,如:“莫”、“横”。

清末以来,有很多收藏家和学者对陶文进行过研究,著录陶文的书陆续出版。时至今日,对汉代陶文的著录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清人的著录和研究

陈介祺的《簠斋藏陶》是现存最早的著录汉代陶文的著作。虽然仅有“汉瓮腹瓦字记”、“汉残瓮考”,但他首先指出陶文多用玺印印成,并把陶文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不外官名、地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②

第一个收藏并研究汉代陶文的是吴大澂。吴氏作《古陶陶文释》、《三代秦汉古陶文字考》,但未见流传。随后,他又著成《读古陶文记》(其中汉代陶文二页)。吴氏未用原拓,全部是摹本,陈介祺阅读并作了题记,现收于《吴恪斋尺牋》第七册。此外,吴氏在其《说文古籀补》里也收录了一些陶文资料。

在陈氏的提倡下,清末陶文藏家辈出。丁佛言、强运开广续吴书,经过收集整理编成《说文古籀补》与《说文古籀三补》,均收录不少陶文。“光

①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年11期,第89页。

②顾延龙《古陶文彙录》自叙,国立北平研究院,1936年。

绪二十年(公元 1894 年),方濬益《缀遗斋彝器考释》收录了簠斋陶文 64 品,附有考释,释文贴切,为学者信服”。^①此外,孙文楷著有《木菴古陶文释》二卷,书名曾列入《山左先哲遗书》丙集,但未刊行。

刘鹗从所藏陶文中选拓五百余品结集为《铁云藏陶》三册(另一册为封泥)。著录陶印 45 方、古封泥 752 块,这可以说是我国学者研究古陶文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著作。

总的来说,此期对陶文的研究尚属传统金石学范围。陶文的藏家、研究者人数不多,研究成果较少。而陶文的著录只是提到某书某人作而已,多未刊行,出版问世的只有刘鹗的《铁云藏陶》。但正是从此,人们开始逐渐认识陶文的重要价值,开始研究陶文。

(二) 民国时期的著录和研究

辛亥革命后,陶文藏家与研究者日渐增多,这一时期与汉代陶文著录、研究有关的著作主要有三部。一是黄宾虹的《陶匱文字合证》(1930 年),该书主要内容是将陶片文字与古匱文字进行对比研究,考其书源。指出“古陶拓片文字,既可证实匱印之用,书体中有雄浑、秀劲,约分两种,皆足为书法源流之参考。”^②这是 20 世纪对古陶文最早的专门研究。二是顾廷龙的《古陶文彙录》(1936 年),该书正编收录 399 字,附编收入 451 字,“合文”6 例。陶文多为单字,有两字以上者,均录全句,不认识的字,收入附录。按《说文》编排,《说文》未收字附列各部之后,字头下注楷体字或异文重文,每字均注明出处,考释列在各字之下,并录文例。

《古陶文彙录》的印行,使得陶文研究有了很好的工具书。该书的缺点是陶文的出处只有引书简称,没有卷、页、片的准确数码,不便读者检核。三是孙浚、孙鼎的《季木藏陶》(1943 年)。《季木藏陶》是周进“收陈氏(介祺)及黄县丁氏精品,复益以新发现者得四千种”,^③是当时极负盛名的一种关于陶文的出版物。缺点是“该书为选本,不免有遗珠之恨,且印数较少,流传不广”。^④

专门研究陶文的论文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主要有张政烺的《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该文开辟了用陶文结合铜器铭文来考证历史的新途径。顾廷

龙的《古陶文彙录·自序》,该序探讨了陶文的出土,陶器的形制,陶文的内容、行款等,是概述陶文的重要文章。而王襄《古陶残器絮语》则就古陶残器之出土、时代、种类、书法、文字、画像、著录等进行了讨论。

此期各书著录的陶文均为传世品,而且陶文著录往往只注重于记载铭文内容,对陶文的出土情况等很少涉及,无法知道陶器的形状和铭文位置,只有个别器形完整的陶器,才有照片或全形拓本留传。同时也由于大量材料印行未广,一般学者很难见到。另外,有关汉代陶文的专题性论述比较少。

(三) 1950 年以来的著录和研究

建国后,汉代陶文的著录和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方面社会上流失的汉代陶文得到了保护,同时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更多的汉代陶文,所得陶文大多有科学的发掘记录,随后一些重要的陶文资料书和工具书陆续问世;另一方面公布这些陶文的报告除释文外,大都在断代、器主(墓主)的推定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围绕这些材料,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一批专题性论文陆续问世。

1. 陶文的著录与整理

1994 年陈直《关中秦汉陶录》出版。此书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关中秦汉陶录》分陶器、瓦当瓦片、砖文、钱范四类,共收录器物 434 品,《补编》亦分四类,收录器物 67 品;《云纹瓦图录》收录器物 55 品;《摹庐藏瓦》收录器物 111 品,书中所收均为原拓。该书是研究秦汉砖陶瓦当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料。遗憾的是许多建国后出土的瓦当及陶文资料未能收入。

1998 年周进集藏,周绍良整理,李零分类考释的《新编全本季木藏陶》问世。所收陶文主要为印款、标记主管制陶的机构名或官职名以及“陶者市籍”。拓片按时代、国别排列,主要为战国和秦汉时期的陶文。

2005 年贾贵荣、张爱芳选编的《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出版。收录清代民国学者研究历代陶文的代表作,包括《浙江砖录》、《陶斋藏砖记》等十一种砖文著作,还包括《秦汉瓦图记》、《十钟山房藏齐鲁三代周秦两汉瓦当文字目》、《汉甘泉瓦记》、《温州古甓记》四种瓦当文著作。2009 年《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续编》出版,此书选辑前书未能收录的一些学者的陶文著作,如清程敦的《秦汉瓦当文字》、清吴大澂藏,吴隐编的《窑斋砖瓦录》等,皆名家名作,图文并茂。这可以看作是研

①高明《古陶文汇编》序,中华书局,1990 年 3 月。

②黄宾虹《陶匱文字合证》,1930 年神州国光社影印本,卷首语。

③孙浚、孙鼎《季木藏陶》,1943 年影印本,孙浚跋。

④周进集藏,周绍良整理,李零分类考释《新编全本季木藏陶》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98 年。

究汉代陶文的经典之作，大大方便了当代学者的陶文研究。

2006年王恩田《陶文图录》出版。全书按断代与分国相结合的体例编排，共收录陶文拓片1.2万余片，在陶文拓片之旁均附释文。该书有许多非常珍贵的拓片，而且是目前所见收录陶文最多的著作。

2. 陶文工具书

1964年，台湾艺文印书社出版了金祥恒的《陶文编》。正编收498字，待问编收582字，未立“合文”之例。此书可视为顾廷龙《古陶文彙录》的一种增订本，著录字数有所增加，每字以阿拉伯数字注明其在某书某册某页某片，合于《说文》者，每字前冠以《说文》篆文及说解以资参考，缺点是未录陶文辞例。

2001年陈建贡《中国砖瓦陶文大字典》出版。所收文字包括商周至秦汉时期的陶器皿及其他陶瓦片上的文字、汉瓦当文字、汉至魏晋南北朝及少量唐代砖刻文字。共收文字一千七百余字，重文万余，合文六十余个。字序按文字时代先后依次排列，可以窥见文字嬗变的轨迹。该书不仅搜罗赡富，而且善于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反映了现当代中国古陶文研究的最高水平。

2007年，王恩田根据《陶文图录》编纂的工具书《陶文字典》出版，收已经释出的陶文1260余字，合文30余字和目前尚未释读的陶文1180余字。是迄今为止收录字数最多的一部陶文工具书。

3. 陶文的考释和研究

在新出土的汉代陶文中，镇墓文占有很大的比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此前罗振玉等搜集并著录过镇墓文，但数量少，缺乏研究。建国后汉镇墓文大量出土并公布于世，相关研究日渐系统、深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镇墓文的整理和研究。

如刘昭瑞《〈太平经〉与考古发现的东汉镇墓文》以《太平经》为根据，用人类学的方法探讨了东汉镇墓文中若干疑难词句的意义及其所反映的方术和社会观念。黄景春的博士论文《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探讨了买地券、镇墓文的性质、起源、发展和现状，分别对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买地券、镇墓文进行释字、标点、注释，并对一些疑难问题做了深入考证。吕志峰《东汉镇墓文考述》对东汉镇墓文的数量、著录、内容、功能、书体及其与早期道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2) 探讨镇墓文与早期道教的关系。

如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

考察了汉代人关于幽灵世界的观念，特别是和道教的关系。连劭名《汉晋解除文与道家方术》对汉晋解除文中出现的“天帝神师”等术语进行了考释，还谈到了道家的方术问题。詹鄞鑫《心智的娱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一书将买地券和镇墓文纳入巫术文化的范围进行研究。

(3) 镇墓文的书体、文体方面的研究。

如王光永《宝鸡市汉墓发现光和与永元年间朱书陶器》指出“人、北、斗”等字是隶书，而“世、黄”等字非常接近汉魏以后的真书，还有“解、阴”等字的写法已是行书体了，这篇陶文给我国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陈直《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考释》一文认为王氏朱书陶瓶的字体多用草隶书，其字体多由草隶向草书、由隶书向楷书过程蜕变。高大伦、贾麦明《汉初平元年朱书镇墓陶瓶》认为“下”、“岁”等字是隶书，“月”介于楷隶之间，“墓”、“丘”更接近于楷书。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东汉镇墓文的书体进行过全面研究。郝文倩《东汉镇墓文的文体功能及其文体借鉴》指出镇墓文将指令性公文作为文体形态的基本框架，在官府文书的语言躯壳内附加了巫术咒语胁迫、恫吓等情感性言辞，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极具时代特色的墓葬文体形式。

(4) 镇墓文的辨伪。

有代表性的论文是陆锡兴的《初平元年朱书瓶的真伪问题》，文章从“初平元年”朱书瓶内容入手，对其进行研究，认为此瓶并非东汉之物，而是后人所作的赝品。

这一时期出现了几位对汉代陶文有专门研究的专家，最具代表性的是陈直先生。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一是引用陶文、瓦文等出土文物订正《史记》、《汉书》，这种以文物证史的治学方法，素为学界所推重。二是铭文综合考释，如《洛阳汉墓群陶器铭文通释》、《广州汉墓群西汉前期陶器文字汇考》。三是对某些特定问题做专门研究。如《西汉陶钱范纪年著录表》指出有纪年题字的都是陶钱范，最早的纪年是昭帝元凤五年，最晚的为成帝永始三年，武、哀、平年号则未见。这也是目前唯一一篇系统考证西汉陶钱范纪年的文章。以上成果散见于《两汉经济史论丛》、《文史考古论丛》、《汉书新证》等专著和论文集中。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语言学这一角度对陶文进行研究。如吕志峰《东汉石刻砖瓦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汇研究》从构词法、词语考释、与大型辞书的对比研究以及用字现象调查等四个方面对东汉陶文、

砖瓦材料的词语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又如周建姣《东汉砖文虚词研究》以词类为纲，对东汉砖文中的介词、副词、代词、连词和语气词进行描述，并与东汉其他文献中的虚词进行对比研究，描述了东汉砖文虚词的总体面貌。

可以说，建国后汉代陶文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陶文中的疑难字逐渐被释出，而且开始关注器物形态、历史背景等，学者们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对陶工的身份、陶器的制造、镇墓文与早期道教的关系等都做了研究。但新出陶文逐年增多，陶文的整理、相关工具书的编撰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砖文

砖文是指刻画、模印于砖上的文字，字数相对来说较多。汉代砖文从内容上看主要有：

1. 记名，包括人名、地名，如“山阳县曲子作”、“雒城”。
2. 纪年，如“建武十六年作”。
3. 吉语，如“富贵昌宜侯王”。
4. 标记，包括记数、尺寸、方位等，如“四百卅”、“七尺”、“中”。
5. 记墓，数量较大的是东汉刑徒砖文，如“右部第三无任任城髡钳时叔永初二年正月廿八日物故死在此下”。

6. 买地券，如建宁元年诸暨买地券：兄弟九人，从山公买山一丘於五风里，葬父马卫将，直钱六十万，即日交毕。分置券台，立右。建宁元年二月朔。■■■■■■律令。^①

7. 杂感，表达所思所感的砖文，口语化特别明显，如“六月七日来”、“王左死，奴复死，苛！”。

汉砖之最早辑录可以上溯至宋代，洪适《隶续》收东汉时期的“永初”、“建初”等五件纪年砖。赵明诚在《金石录》第三十八条下载有西汉时期砖铭，并且还有“成帝阳朔四年”的注解。此时学者对砖文的重视程度不够，对汉代砖文仅仅是集录，并非研究。真正有意识地为存古和研究之用，应从清代为始。自那时起至今，汉代砖文的著录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清代的著录和研究

清代金石学发达，著录砖文的著作较多，主要有：

孙星衍、邢澍编《寰宇访碑录》。全书共 12 卷，

集录石碑、砖瓦 7000 余目，全书依时代为序，于各器物之下注明其书体、撰书人姓名、碑刻年月、后人题记及碑文，同时还注明石碑的所在地及砖瓦的藏家。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5 卷，罗振玉《再续寰宇访碑录》2 卷，刘声木《续补寰宇访碑录》25 卷，皆补孙书所未备。

冯云鹏《金石索》，收历代石刻以及带字的砖和瓦当，每种器物大多有器形图和铭文拓本，后面有冯氏的释文或考订，是综合性的古器物图谱。

陆增祥著《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录砖文 170 种，以收藏汉晋年间的纪年砖为主，收“元凤砖”等汉砖约 8 种。按时代排序，每件在标题下详记形制、书体尺寸和今在地点，然后是录文等，最后附各家评述和自己的按语，是著录砖文的重要著作。

陆心源《千甃亭古砖图释》，全书辑录了上自汉代下迄元朝的古砖 1320 余件，其中两汉砖约 43 件，按时代排列，无纪年的附于卷后。每砖都注明标题、尺寸、录文、作者按语或出处，砖文及图案原拓影印。是研究砖文的经典之作。此外其《千甃亭砖录》也著录了一些汉代的砖文，遗憾的是没有摹本。

端方《陶斋藏砖记》，书中收录范围很广，包括砖刻的墓志、镇墓文、题记、陶文、瓦当文字等，其中收汉刑徒砖 113 块，并对其进行文字释读。结合《郡国志》《刑法志》等对砖志中古地名变迁以及汉代刑罚改革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砖文残缺部分进行了富有根据的推断。同时书中还指出了古汉语中某些文字通用的情况，对汉字字体的变化也进行了讨论。

这一时期与汉代砖文有关的著作还有一些，如孙诒让《温州古甃记》、戴咸弼《东甌金石志》、冯登府《浙江砖录》、吕佺孙《百砖考》、宋经畬《砖文考略》、吴隐《遯盦古砖存》等。

与宋代相比，这一时期著录的汉代砖文数量有明显的增加。但上述砖文多数是个人收藏，主要工作是搜罗汇集。由于缺乏科学的发掘记录，研究者在收藏及著录时，大多是以经验判断或听信妄言，总不可避免将赝品混入或出现误断。而且，由于受旧金石学的影响，砖文著录大都只拓文字，仅仅做了一点文字考据、注释之类的工作，对砖文书法艺术的阐发、书体字体的考证和研究则很少，有的仅注明砖文的书体。此外，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图像与原拓仍然有差距。

（二）民国时期的著录和研究

民国时期在搜集砖文和汇编资料方面贡献最大

^①杨士安《诸暨散论》，作家出版社，2001 年，第 49-50 页。

的当推罗振玉。《恒农冢墓遗文》(1915年)摩绘31块孟津所出汉代刑徒砖拓本,论其时代、刑人、籍里,考证汉代刑徒制度,是研究刑徒砖文不可或缺的史料。1916年辑录的《古明器图录》为中国明器著录之始。《恒农砖录》(1917年)汇录刑徒砖志231块,收录了清末出土的大部分刑徒砖,而且纠正了《陶斋藏砖记》的许多讹误。《地券征存》(1918年)收录了汉代的买地券,还收录汉至宋代记墓砖81块。1918年校印《楚州城砖录》,1934年增订《高昌砖录》。《贞松堂集古遗文》对“土地买卖文书的买地契约”和“宣扬封建迷信的镇墓券”的分类以及指出鉴别买地券的真伪应着重于券文所书的年月日上,也是颇有见地的,这对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此外,黄瑞《台州砖录》、吴隐《窰斋砖瓦录》、黄文弼《高昌砖集》、王晋卿《汉魏六朝砖文》等也收录了一些汉代砖文。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对砖文的收录和初步分析。

(三) 1950-1980年的著录和研究

建国以来,砖文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一是有关汉代砖文的科学调查和发掘成果陆续发表在相关刊物中;二是随着出土砖文的日益丰富,汉代砖文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文化、语言、艺术等都有所涉及,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此时砖文的著录和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东汉刑徒砖文的著录和研究

建国后,考古部门在河南偃师县汉魏故城出土较完整的刑徒墓砖9块^①。1964年对洛阳南郊刑徒墓地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出土刑徒墓砖820余块,计7143字^②。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公布了东汉刑徒墓地的发掘资料,以及散存于社会及著录发表的东汉刑徒砖志的统计记录,并对砖志铭文进行统计和考释,具有极高的科学参考价值。陈直《吕不韦戈的“寺工”、洛阳刑徒墓砖“无任”两名词的释义》、《东汉“吾阳成”墓砖释义》对相关名词的含义进行了考释。吴荣曾《汉刑徒砖杂释》对髡钳、完城旦等进行了考论。许景元、李淼《东汉刑徒砖文及其书法特色》则关注刑徒砖文的书法特色,在砖铭书法研究上具有开拓意义。

^①黄士斌《汉魏洛阳城刑徒坟场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第40-44页。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期,第2-17页。

2. 亳州曹操宗族墓砖文的著录和研究

曹操宗族墓字砖自出土以来,相继有研究文章发表,对墓主人的身份、家世、与曹操的关系、其他人员的身份、地位和曹氏家族的关系及砖文中反映的社会问题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如关尾史郎《关于安徽曹氏一族墓葬的几个问题》、侗屡《建安初期的人民文学——亳县曹墓部分砖文初探》、李灿《从曹氏墓砖看古代中日关系》等。此外,《安徽亳州市发现一批汉代字砖和石刻》对曹操宗族墓中的字砖进行了释文。

对其书法艺术的专题研究也有相关文章发表,如沈茹崧、潘德熙《从亳县曹墓字砖窥测东汉书法之一斑》一文认为曹墓砖文在书体分类上以隶书为主,草书(包括章草、今草)次之,篆书、行书极少。李灿的《曹操宗族墓砖文书体考》认为宗族墓砖文以真行书为主,隶书次之,章草、今草再次之,篆书只有几个字;在章草和今草的关系上,认为章草、行书和今草之间不是顺序的递承关系。两篇文章都认为,东汉时期行书已成熟,楷书开始萌生。王远《曹操宗族墓书法研究》一文将砖文与同墓出土的铭石、碑刻等作比较分析,将书体演变与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分离开来研究,并对书写形式、用笔、线条、结体、章法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归纳与分析。

3. 汉代买地券的著录和研究

罗振玉是搜集并著录汉代买地券的第一人,成果主要集中在《贞松堂集古遗文》、《地券征存》、《蒿里遗珍》、《芒洛冢墓遗文四编补》等著作中,但仅仅是对买地券的收录和初步分析。建国后,学者对买地券的研究内容更加全面,在正名、溯源、性质、辨伪及其书法特点等方面都有相关文章发表。

(1) 买地券的综合研究。

吴天颖《汉代买地券考》是目前为止对汉代买地券研究最为全面和权威的文章。他从经济学角度入手,认定买地券是随葬明器,他结合历史背景,对买地券产生的原因和买地券发展演变的阶段进行了探索,这是第一篇探讨买地券起源的论文。他还指出了干支纪年鉴别辨伪的不足之处,且做了恰当的补充。吕志峰《东汉买地券著录与研究概述》从发端、其他著录、赝品著录三个方面概述了东汉买地券的著录情况,从正名、溯源、性质探讨、辨伪、作为史料之用及其他等六个方面概述了东汉买地券的研究情况。鲁西奇《汉代买地券的实质、渊源与意义》指出买地券起源于民间巫术,书写者主要是巫覡,书写规则与书写内容主要取决于巫覡方术的准则,而并非亡人及其基地的实际情况。

（2）买地券的辨伪。

方诗铭《从徐胜买地券论汉代“地券”的鉴别》一文提出了关于鉴别汉代地券的三点意见：

一、干支纪日是否相合；

二、所记土地的所在地是否符合汉代地方基层的行政区划；

三、所记的土地价格、名词习语等是否符合汉代实际情况。

李寿冈随后发表《也谈“地券”的鉴别》一文，就方文“干支纪日是否相合”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买地券并不是真实的土地买卖契约，这种地券的干支本来就是任意填写的。作为回应，方诗铭又写了《再论“地券”的鉴别——答李寿冈先生》一文，指出应重视“买地券”与“镇墓券”的区别，并列出了他认为属于土地买卖文书的六件汉代买地券。同时对李文提出的疑问一一进行了回答，指出了李文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观点。

（3）利用买地券进行相关学科的研究。

蔡子鹤《汉至唐宋买地券语言研究》一文在系统搜集并整理已经出土的汉至唐宋买地券材料的基础上，做了文字的再释读和校补、词语的考证、重新断句等相关工作，从源流上分析买地券的重点习语。吕志峰、周建姣《东汉买地券及镇墓文词汇研究的价值》指出东汉买地券及镇墓文对于了解当时的口语情况、全面认识东汉时期的语言面貌乃至对汉语史的研究都有一定价值。黄景春《买地券、镇墓文研究及其语言文字学意义》指出买地券的语言文字学意义在于保留了古代民间口语的原生形态，证明汉字新字体、新书体的出现都始于民间书法活动。詹鄞鑫《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一书从巫术及文化史方面，说明买地券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方面内容以前少有学者关注，颇具价值。华人德《谈买地券》一文详细介绍了买地券的书法特点。

（四）1980年以来的著录和研究

专门研究砖文的著作有明显的增加，主要有以下几种：王镛、李淼《中国古代砖文》（1990年）。该书“概述”介绍了砖文的产生发展、内容形式、著录研究等，从砖文与书法史关系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砖文体现的书体、笔法的演变，从砖文书法的艺术特色角度阐述了砖文的表现手法。对字砖作为一种民间书法的属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然后原迹影印先秦至隋唐时期的砖文并附有释文。由于着重表现砖文的书体特征，所以该书只是举例性

地选取不同时代的砖文，对汉代砖文的收录不够全面。殷荪《秦汉砖铭百种》（2002年）收集秦汉砖铭文字100种。分先秦、秦、西汉、王莽、东汉各个历史时期，有大篆、小篆、古隶、隶、章草、隶楷各种字体，内容有姓氏、地望、干支、年号、纪事等各个方面，导论部分对秦、汉砖铭所作的断代分析，尤为精彩。金翔《故鄣砖录》（2007年）对东汉、西晋纪年字砖之考释颇为精彩，作为一部地方性砖志，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浙江安吉地区的汉晋古砖，切入点虽小，但剖析研究较深。

工具资料性著作的编撰也有了典范性作品。殷荪《中国砖铭文字徵》（1996年）收单字字头1900余个，重见字23800余个，合文（含连笔）1200余条，重文20多条，未能隶定者500余个，共有25000余个（条）字例，是搜辑中国古代砖铭之专门字书。每篇文字均附出处、所属王朝之国号、年号等。对于砖铭中之错字、别字、异体字、通假字以及不同体相之不同结构、形体之讹变，一并列出。前人误释，悉予改正。1998年殷荪又出版了《中国砖铭》，收刻字砖多达五百种，目前可见的东周至清代的砖文，书中基本收录齐备。正文按时代原拓影印历代砖文，有的还附有释文。2008年胡海帆、汤燕《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出版，收录西汉刻砖17件，东汉686件，将原砖材料的出处、尺寸、出土地点、时代等一一附上，其砖铭及分类的研究颇有见地。

一些学者还撰文对砖铭进行考释，如谷丰信著，许道胜译的《中国唐以前纪年砖铭文之考察》用实证法对纪年砖铭文的表示方法、样式、构成要素等进行了探讨。陆锡兴《“黄君法行”朱字刻铭砖的探索》对“黄君法行”刻铭砖进行了考释。而研究砖文书法艺术的文章尤多，创获亦多，如王镛《汉晋砖文的书法艺术》首次从书法审美的角度关注汉砖书法的艺术性。高文《四川出土汉砖文书法选序》指出“五凤年砖”至“永汉二年”39块年号砖是研究中国汉代隶书发展演变过程、隶变早期特征的重要资料。杨琼、雒启昆《四川汉代纪年砖字砖书法艺术初探》认为字砖的书法风格的演变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丛文俊《关于汉代出土金石砖瓦文字遗迹之书体与书法美的问题》对吉语砖、纪年砖的主要书体形成与延续的过程以西汉模印砖文为例进行具体剖析，全面讨论了它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与艺术价值。陈道义《汉代文字瓦当与砖文的装饰意味及其文化阐释》从笔画姿势、结构形态、整体意识三方面论述了汉代文字瓦当和砖文的装饰意味。

汉代砖文的著录和研究均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汉代砖文的全面整理和科学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尤其是文字释读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影响了砖文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相关领域研究者的使用。

三、瓦文

瓦文指瓦当及瓦片上的文字。瓦当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建筑瓦件,是古代建筑物之筒瓦尾端下垂的部分。文字瓦当在汉瓦当中最具时代特色。从字数来看,汉代瓦文以一字、二字、四字者居多,也有六字或与其他图案相结合者。从文字内容来看,涉及面很广,主要有以下六类:

- 1.表明官职,如:“上林农官”。
- 2.表明建筑物名称,如“上林”。
- 3.表明墓葬名称,如“长陵西神(长陵宫殿所用)”。
- 4.纪实记录之词,如:“汉并天下”。
- 5.用于私宅,如“吴尹舍当”。
- 6.吉语,如“长乐未央”。

早在北宋时期,汉代瓦文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逐步展开了研究,王辟之《澠水燕谈录》提到“羽阳千岁”^①瓦当,为瓦当的最早著录。黄伯思《东观余论·古瓦辨条》也提到“羽阳千岁”^②瓦当,他还记录了耀州出土的“益延寿”瓦当,并作了考证,订正了颜师古注《汉书》之误,首开瓦当文字考据之先河。这些早期的著录都只有文字,没有摹本,比较简略。南宋吕大临撰《续考古图》卷一摹拓四种瓦当文字,为“益延寿”、“官立石苑”、“长乐未央”和“羽阳千岁”^③。元李好文《长安志图》谈到“长乐未央”、“羽阳千岁”^④等文字瓦当,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指出得于陈仓(今宝鸡),与今日考古调查相符,并发现“长乐未央”并非瓦文所称宫殿专用字瓦。这是汉代文字瓦当研究的萌芽时期。

时至清代,金石学发达,瓦当被看成一种古董,为人们竞相收藏。从清末到民国,瓦当逐渐成为受大众喜爱的收藏品,相关著录著作也相继问世,如康熙年间林佶著的《汉甘泉宫瓦记》中有“长生未央”瓦当。到了清乾隆年间,朱枫编纂成《秦汉瓦

图记》,这是研究文字瓦当的最早专著。其后程敦撰《秦汉瓦当文字》2卷,续1卷,收录瓦当139品,异文50多种,并附有详细考证。毕沅《秦汉瓦当图》1卷,陈广宁《汉宫瓦当》1卷,钱坫《汉瓦图录》4卷,王福田《竹里秦汉瓦当文存》,吴隐《遯盦秦汉瓦当存》等都是著录研究瓦当的著作。另外,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冯云鹏、冯云鹗《金石索》,王昶《金石萃编》,端方《陶斋藏瓦记》,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吴大澂《愙斋砖瓦录》、申兆定《涵真阁秦汉瓦当图说》、王仙洲《古瓦绘图》、王襄《簠室古簠》、黄中慧《琴归室瓦当文钞》、何遂《绘园藏瓦》、钱亦轩《半宫瓦当文考》、高鸿裁《尚陶室砖瓦文攷》、陈介祺《簠斋藏古目》、张廷济《清仪阁古器物文》、陈抱之《求古精舍金石图》、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钱泳《履园聪话》、吴式芬《攷古录》等书都著录了一些汉代的文字瓦当,为瓦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罗振玉的《秦汉瓦当文字》5卷,共收录瓦当148种319品,都是清代学者赵魏、钱坫、俞肇修、宋葆醇、王福田、吴式芬、陈介祺、潘祖荫等人旧藏,对清代以来学者的瓦当研究作了总结,著录丰富,为研究秦汉瓦当提供了参考资料。但这一时期有关文字瓦当的著录都仅限于对瓦当图像之摹拓及文字之记录,鲜有考证,基本上停留于收集和汇编材料阶段,至多也只不过把它当做一种古拙的艺术品加以玩赏而已,至于学术研究则似乎无从谈起。另外收集著录多以汉文字瓦为主,重复多,新品少。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事业发达,获得了大批新的瓦当资料。这些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瓦当,研究价值更高,而瓦当的辑录和研究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是科学的瓦当资料汇集与研究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汉代瓦文的著录和整理:

1964年陕西省博物馆编辑出版的《秦汉瓦当》一书,收录秦汉瓦当153件,多数标明出土地点,并对其时代特点作了分析归纳。八十年代以后,相继有许多部瓦当专书出版,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新编秦汉瓦当图录》,徐锡台等《周秦汉瓦当》、刘士莪《西北大学藏瓦选集》、西安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秦汉瓦当》、傅嘉仪《秦汉瓦当》、华非《中国古代瓦当》、杨力民《中国古代瓦当艺术》、钱君匋等《瓦当汇编》、朱思红《屋檐上的艺术—中国古代瓦当》、吴荣曾《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瓦当》、戈父《古代瓦当》、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

①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9,《四库全书》小说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36册,第520页。
②黄伯思撰、黄仍编《东观余论》卷46上《古瓦辨》,《四库全书》杂家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50册,第325页。
③吕大临《续考古图》卷1,《四库全书》谱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3-284页。
④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四库全书》地理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8册,第489页。

图典》、安立华《齐瓦当艺术》等。1996年开始进行《新中国出土瓦当集录》的编撰工作，对新中国成立后经考古发掘出土和部分调查采集的瓦当按遗址分卷，编辑成册，分集出版。目前已出版《齐临淄卷》和《甘泉宫卷》，《燕下都卷》、《秦雍城卷》、《汉长安城卷》、《汉陵卷》、《汉魏故城卷》、《唐长安城卷》、《唐洛阳城卷》也即将出版。2004年，王培良收集素材、潜心研究，写出并出版了50余万字的理论著作《秦汉瓦当图论》，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2008年，焦南峰的《雍城秦汉瓦当集粹》收录雍城秦汉瓦当近400枚，阐述了秦汉瓦当的工艺流程，对研究者和爱好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瓦当集录的编者均为多年从事相应遗址考古发掘的专家，拥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选录瓦当均采用实物原件拓片，并附有释文，集中反映了1949年以来考古出土瓦当的全面收获。

国外学者对我国古代瓦当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伊藤滋的《秦汉瓦当文》、下中弥三郎的《书道全集》、堀口苏山的《秦汉瓦瓢集缘》、关野雄的《半瓦当研究》等。

（二）瓦当的考释与研究

学术界已经认识到了文字瓦当的重要价值，对瓦当文字做了很多有价值的考释。重要的有：林剑鸣的《汉甘泉宫瓦当文字考释》、徐锡台的《几个汉、晋文字瓦当考释》、罗宏才的《汉富贵毋央瓦当考略》、赵平安的《两种汉代文字瓦当的释读问题》、袁仲一的《秦汉文字瓦当释谈七则》等。

除了考释文字的文章外，还出现了综合研究文字瓦当的著述。陈直《秦汉瓦当概述》一文概论了秦汉瓦当研究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说明了秦汉瓦当的书体和规格、瓦文的字数和语言特征，还论及瓦当的著述、藏家、瓦价、拓墨及伪刻之概貌。将文献典籍研究与田野实践结合起来，对秦汉瓦当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为我们利用瓦当文字考察秦汉观念及演变给予了极大的启迪和方便。刘庆柱《战国秦汉瓦当研究》以考古发掘所获得的瓦当为基础，对关中、齐鲁、燕赵等地区的瓦当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很多重要见解，使我们对这些地区的战国秦汉瓦当面貌有了较为清晰的总体认识。其《汉代文字瓦当概论》、《汉长安城遗址及其出土瓦当研究》等文以考古发掘所获得的瓦当资料为基础，对秦汉瓦当的纹饰、制作工艺、文字瓦当产生的时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特别是提出的有关瓦当研究的方法，为今后的瓦当研究提供了参考。

不过目前关于瓦当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全

面、有深度、综合性的研究论著还不多。

（三）工具书的编撰

1996年韩天衡编成《古瓦当文编》。书中收单字330余个，瓦当文字3400多个，上起秦汉，下至南北朝。此书的问世填补了古瓦当文字无专辑的缺憾。

四、余论

应该说，经过前人和时贤的努力，汉代陶文的著录和研究均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为我们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以前的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至今既没有综合而全面的汉代陶文资料汇编问世，也没有编出穷尽收录汉陶全部字形的文字编；第二，作为基础工作的文字释读做得不尽如人意，影响了陶文价值的体现和相关领域研究者的使用，也影响了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可靠性；第三，研究者或只以个别或部分材料为对象进行研究，或以部分材料对某个或某些问题进行研究，还没有以传世和出土的所有汉代陶文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第四，缺乏比较研究成果，如能将陶文与石刻、玺印、简牍等其他文字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必将大有收获。

参考文献：

- 丛文俊《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陈根远、朱思红《屋檐上的艺术——中国古代瓦当》，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
傅嘉仪《秦汉瓦当》，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
戈父《古代瓦当》，中国书店，1997。
顾廷龙《古陶文彙录》，国立北平研究院，1936。
胡海帆、汤燕《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
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教育出版社，2002。
韩天衡《古瓦当文编》，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1996。
金祥恒《陶文编》，台北艺文书馆，1964。
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
陆心源《千甌亭古砖图释》，十万卷楼刻本，1891。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
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石印本，1914。
罗振玉、程敦《秦汉瓦当文字》，齐鲁书社，1981。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9·秦汉金文陶文》，荣宝斋，1992。
钱君匋《瓦当汇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陕西省博物馆《秦汉瓦当》，文物出版社，1964。
陕西省考古所秦汉室《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

1986。

王镛主编《中国书法全集九·秦汉金文陶文卷》，荣宝斋，1992。

王镛、李淼《中国古代砖文》，知识出版社，1992。

西安市文管会《秦汉瓦当》，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徐锡台《周秦汉瓦当·周秦瓦当概述》，文物出版社，1988。

殷逊《中国砖铭》，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

周进集藏，周绍良整理，李零分类考释《新编全本季木藏陶》，中华书局，199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文物出版社，2007。

姚生民《新中国出土瓦当集录·甘泉宫卷》，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

安志敏《元兴元年瓦当补正》，《考古》，1959年第11期。

陈道义《汉代的文字瓦当与砖文的装饰意味及其文化阐释》，《艺术探索》，2008年第8期。

沈茹崧、潘德熙《从亳县曹墓字砖窥测东汉书法之一斑》，《书法研究》，1981年第7期。

陈直《秦汉瓦当概述》，《文物》，1963年第11期。

董珊《从〈新编全本季木藏陶〉谈到古陶文的发现与研究》，《书品》，2000年第1期。

黄景春《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华东师大2004届博士论文。

黄盛璋《元兴元年瓦当与西海郡》，《考古》，1961年第3期。

高文《四川出土汉砖文书法选序》，《中国书法》，1987年第2期。

高敏《秦汉时期的亭》，《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

雷百憬《西汉一文字瓦当考释》，《文博》，1993-1。

林剑鸣《汉甘泉宫瓦当文字考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李灿《曹操宗族墓砖文书体考》，《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秦汉金文陶文》，荣宝斋出版社，1992。

李启良《陕西安康地区出土秦汉瓦当》，《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

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

刘庆柱《汉长安城遗址及其出土瓦当研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

刘庆柱《汉代文字瓦当概论》，《中国书法全集·秦汉金文陶文卷》，荣宝斋，1992。

刘庆柱《秦“十二字瓦当”时代质疑》，《人文杂志》，1985年第4期。

吕志峰《东汉买地券著录与研究概述》，《南都学坛》，2003年第3期。

吕卓民《从考古资料看秦汉时期咸阳的制陶冶》，《文博》，1989年第3期。

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

石兴邦、马建熙、孙德润《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汉刘邦长陵勘察记存》，《文物》，1984年第2期。

王王忠《略谈秦汉瓦当的时代特征》，《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

王王忠《秦汉瓦当管见》，《文博》，1984年第1期。

吴荣曾《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瓦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曾庸《西汉宫殿、官署的瓦当》，《考古》，1959年第12期。

何琳议《古陶杂识》，《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

王镛《汉晋砖文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1987年第2期。

王王忠《略谈秦汉瓦当的时代特征》，《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

王王忠《秦汉瓦当管见》，《文博》，1984年第1期。

许景元、李淼《东汉刑徒砖文及其书法特色》，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秦汉金文陶文》，荣宝斋出版社，1992。

徐锡台《凡个汉、晋文字瓦当考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杨琼《福建崇安汉代城址出土的建筑材料》，《文博》，1990年第1期。

姚生民《陕西淳化出土秦汉市亭陶文陶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

俞伟超《秦汉代的亭市陶文》，《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

杨综《崇安汉城出土瓦当的研究》，《文物》，1992年第8期。

郑超《战国秦汉陶文研究概述》，《古文字研究》第14辑，中华书局，1986。

赵璐、侯海英《秦汉时期的陶文、瓦文和砖文》，《华夏文化》，2001-2。

张丽华《秦汉文字瓦当赏析》，《美术研究》，1989年第4期。

张其海、林忠干《福建崇安汉城遗址出土文字符号》，《考古与文物》，1988-4。

（责任编辑：刘兵）